

★ 中国基督教研究专题 ★

※主持人段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较之于中国其他地区,西北地区的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研究都比较薄弱。目前学界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本期的这组论文,是2007年6月5日到6月6日在兰州大学举办的“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相关议题的论文,两篇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切入西北基督教的研究,一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解读中国的基督教现状。汤开建教授的文章对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边远的甘青地区传教活动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资料收集十分丰富,对史料的掌握之详、把握之准,在国内有关研究中也难有人比拟。汤开建教授的文章表明,甘肃天主教在清中期之后,虽然历经教难,但由于传教士及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这一论断推翻了以往认为在雍乾之后中国天主教基本被消灭的论断。段琦研究员的论文利用《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书中提供的有关资料,从若干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甘肃省基督教状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说明当时甘肃省基督教各项事业的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绝大多数的省份,文章还讨论了其对今天甘肃省基督教的影响,丰富和充实了薄弱的甘肃省基督教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李创同教授与林连华的论文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作为外来人口教会的x市基督教T聚会点的形成、发展过程,并以此为案例讨论了“以堂带点”管理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重要且为人所忽视的问题,不仅如此,作者扎实的田野工作学风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所提供的详实个案也将产生更广泛的意义。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汤开建 刘清华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内容摘要: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关键词: 甘肃;天主教;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教案

中图分类号: B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7)05-0054-13

作为基督教一支的景教,早在唐元之际已传入甘肃,但入明以后,甘肃之景教已经绝迹。迨至明末,随着天主教的入华,特别是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成功进入北京,天主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僻处西陲的甘肃也开始有了传教士的足迹。入清以后,继续有传教士进入甘肃,并在兰州、武威、甘州等地率先建立教堂,使天主教在甘肃获一定程度的传播。康熙末年开始的禁教时松时紧,甘肃的天主教虽遭打击,但迨至乾隆末年,其传教活动仍然可见。学术界近年逐渐关注区域传教史之研究,然于甘青早期传教史的研究则惜于零散与粗疏^[1],本文拟梳理中西文资料,将上迄明末下至乾隆末期的

甘青地区传教活动勾辑成文,并辅以考证,以求教于学界。

一、明末清初进入甘青地区的耶稣会士

关于明末清初甘肃天主教传教问题,中国史籍与文献鲜有载录,西方天主教文献记录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问题仍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而地方教会史学者或地方志编纂者,或据教会内传,或依据并非第一手资料的旧籍,对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甘肃之事作了种种述说和断语,且相互抵牾,桀骜甚多,故有必要对诸种早期传教士在甘肃活动事迹作一系统梳理,以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7-08-29

作者简介:汤开建(1949-),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港澳史及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万方数据

1. 鄂本笃。第一位进入甘肃地区的天主教传教士应是葡萄牙耶稣会士鄂本笃(Benoit de Goëz)修士。当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进入北京后,中国天主教获得迅速发展。但当时的葡萄牙远东天主教总部果阿方面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只知道“此国有基督徒,有教堂、司铎,有天主教礼仪。”^{[2]110} 果阿方面急需了解中国,故想在陆上开辟一条通途,直达北京。当时出任果阿总主教的梅尼赛斯(Alexis de Menesses)就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熟悉多种南亚、中亚语言的鄂本笃修士。

鄂本笃借亚美尼亚人依撒克(Isaac)于1602年12月2日从莫卧儿王国的亚格拉出发,经拉合尔、白沙瓦、叶儿羌、库车、吐鲁番、哈密,于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12月22日到达肃州。到达肃州后,由于沿途官府及回教徒的“种种刁难和阻挠”,“等待着他们的艰险,竟百倍于前者”^{[2]115}。因此,鄂本笃在肃州两次修书致在北京的利玛窦,希望利氏派人来接他进京。后鄂本笃又染疾,卧病在床,至1607年4月11日去世。鄂本笃在肃州居停一年半时间。鄂本笃虽然是葡萄牙天主教修士,但他这次到甘肃只是旅行途中因故居停肃州,并无在甘肃传教之使命,因此鄂本笃至甘肃并不能算作甘肃天主教的开教。但鄂氏的日记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回人欠他的帐目也被他们夺走,又欺侮那些亚美尼亚人与鄂氏在途中所收养的儿童,并谓他们原为回教徒,因上鄂氏的当而不拜阿拉了。^{[3]374}

这说明,鄂氏曾将收养的几个穆斯林儿童授洗,使其改崇天主教。笔者认为,鄂氏的这一行动为明清之际天主教在甘肃境内最早的传教活动。

2. 金弥阁、杜奥定、高一志、郭纳爵及万密克。甘肃本地教会人士同文轩先生撰写的《甘肃天主教志》记载:

明崇祯十一年(1638)前后,由创设于明天启五年(1625)的原山陕教区山西绛州、蒲州与陕西西安等地来甘肃传教之耶稣会士比利时弗拉芒人金弥阁、意大利人杜奥定、高一志、葡萄牙人郭纳爵、德国人万密克,在我省凉州西乡松树庄、永昌东乡永宁堡,九坝与山丹南乡徐家盘山等地,劝化受洗入教之少数乡人,及初步所建之简易教堂。^{[4]9}

同文轩先生在同书中又指出:武威西乡松树庄、永昌永宁堡、永昌东乡九坝、山丹徐家盘山等四座天主堂均初建于崇祯十一年(1638)^{[4]4651}。

同文轩先生的这一说法,并无原始资料的出处。而查阅费赖之、荣振华及方豪神父有关耶稣

会士金弥阁、杜奥定、高一志、郭纳爵及万密克等人的传记资料,均无上述传教士进入甘肃传教的记录。可以说,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同文轩先生这一说法的中西文原始资料的凭据,姑且存疑。但高一志、杜奥定、郭纳爵等在崇祯十一年前后确实在陕西传教,当时甘肃尚属陕西,或可当时几个西教士确实来过甘肃而为人之略记。

3. 方德望。真正进入甘肃传教的第一位传教士应是方德望。方德望(Étienne Le Fèvre)神父,字玉清,法籍耶稣会士,1630年10月入华,1635年到陕西传教,并开教于汉中,后进入西安传教,主持陕西教务,以致陕西入教者甚众。从现存资料看,方德望应该是最早进入甘肃传教的耶稣会士:据《武威市志》载:“据《甘肃通志》载:清康熙四年(1665),比利时会士方玉清从陕西汉中来武威传教。”但不知此据何种《甘肃通志》?方德望为法兰西人,非比利时人;方德望死于顺治十六年(1659),何以康熙四年还来武威传教,武威市志显然传说。《甘肃通志稿》之《外交志》载:“明神宗朝法兰西教士方德望传教陕甘,甘肃教务属西安总堂,派教士来甘敷教,有左司铎,王司铎者,皆华籍。”^{[5]6}

同上书之《民族志》又载:“甘肃传教……或云明神宗时传来,由西安总堂管理。”^{[6]21}此载亦为传说。其一,方德望入华在崇祯三年(1630),时为毅宗朝,非神宗也^{[2]228};其二,明末甘肃不可能出现华籍司铎,中国第一位华籍司铎为罗文藻,时在顺治十一年(1654),此乃后人附会^{[7]335}。然方德望确实来过甘肃传教,应在方氏开教汉中以后。《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载曰:

崇祯七年,方公奉命入陕。有韩姓官,圣名斯德望,帮助方公传教,教务日有起色。初立堂于汉中,渐推及他城……其时陕省虽遭李闯之乱,居民流离失所,而教务兴隆,如潮如涌,二十年后,传教十五城,投洗至二万四千之多。方公之存神过化,可想而知,惜其传教事实,失于记载,多不可考。^{[8]121}

据费赖之书,1635年方德望开教汉中、城固、洋县。汉中西行即入甘肃天水,方德望后来“传教十五城”^{[9]①},即应包括进入甘肃的传教。胡士斌先生《天主教天水教区传教史》引《方德望神父小传》称,“1636(或1637)年,法籍耶稣会士方德望应陕甘总督之请,由汉中至兰州、灭蝗传教”^{[10]11}。这一说法人体可信。又《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公坟碑记》载:“麦公之米兰、凉传教,适继方

①而德氏兄弟译本将“传教十五城”译为“在洋县、城固县和汉中府建立了若干新的堂口”。

公之后,盖方公之来教于吾教区之永宁堡也,尚在康熙中叶。故老相传遗译未斩,史编集志,有遗迹有寻。”^{[11]226}永宁堡在今武威与永昌之间,此碑所言之“方公”,当即法籍耶稣会士方德望。此碑虽是民国三十年迁葬麦公坟时所立,但关于麦公传教旧事,当是录自旧碑,故所言可信。但“尚在康熙中叶”一句,当是后人推测时间,明显失误。方德望入甘肃传教之事据《甘肃天主教志》:

方德望于顺治十二年(1655)由陕西汉中乘甘肃传教,并传教于凉州西乡松树庄、永昌东乡九坝村、永宁堡、山丹东乡老君甘泉子、南乡徐家盘山一带(上述传教地点除永宁堡外,方德望于其他地点的传教并无原始凭证)。^{[4]9}

这一说法比较合理。1641年方德望曾进京工作,清军进京后,1647年,方神父又回到陕西:“有时居住在西安府,有时在汉中,而他的同伴则在其他城镇传教。”^{[2]232}方神父病逝于顺治十六年,故可知,顺治十二年时,方神父进入甘肃传教当为可信。

4. 白乃心、吴尔铎。继方德望神父进入甘肃的欧洲传教士是奥地利籍耶稣会士白乃心(Jean Grueber)与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吴尔铎(Albere d'Orrille)。耶稣会总会为了寻找一条比海路更安全便捷的通往中国的陆路。1656年2月8日,新上任的耶稣会总会长向白乃心发出训令,派遣他执行这一任务。1658年7月白乃心抵澳门。不久,被北京耶稣会负责人汤若望邀请赴京,并征得顺治皇帝的同意,白乃心与吴尔铎均拿到清政府的旅行护照,于1661年6月从北京启程,一个月后到达西安,大约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到达西宁。两位神父在西宁逗留了半个月,并“多次测量了西宁的纬度和高度,还对那里的城墙进行考察”^{[12]312}。虽然两位神父在西宁居停了半个月时间,留下了欧洲传教士的足迹。但从他们在西宁进行的活动来看,主要是科学考察,而无传教活动。

5. 李方西。《甘肃天主教志》称:“康熙元年,有耶稣会士、传教士意大利人李方西(De Ferrariis, Giovanni Francesco),由陕西西安来甘肃传教,1665年于凉州建教堂,并于同年由四位摄政大臣作出的康熙朝第一次禁教期间遭逮捕驱逐。”关于李方西神父甘肃传教事务,可证于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中:“李方西,字六字。(又名)何泽国,字灿旺……1659年在西安,1662年左右在甘肃,1665年仇教期间被捕。”^{[13]172}

万方数据

据荣振华提供的资料,李方西来过甘肃传教应确有其事,是否如《甘肃天主教志》所言1662~1665年间均在甘肃居住,并于1665年在凉州建教堂,同时又在甘肃被捕呢?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提供的讯息否定了上述说法:“正当传教事业前途无限美好的时候,四辅臣却颁布了攻击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谕旨……神父不愿躲避,径自回到西安总堂,准备投案。5天之后,神父被捕入狱。”^{[2]285}

这一资料表明康熙三年(1665)教难爆发时,李方西在西安被捕,牢中关押4个月后,被押送到广州。故1665年李方西不可能在凉州建教堂。余以为,李方西康熙元年(1662)左右曾到过甘肃传教应为事实,但是否到过凉州,是否在凉州建堂,并无确切资料证明。值得注意的是费赖之《李方西传》中的一条资料:

李方西神父组织了40个热心善会,会员们都非常热心,四出奔走从事培训新教友和劝化外教人的教灵工作……于是,一些热心而又明白教理的教友就代替神父奔波于省内最遥远的地区……还有一位教友因料理私事走到鞑靼边境甘州府,由于他的高尚德表和循循善诱,竟有200余人弃绝佛道,改信天主。^{[2]285}

荣振华则称李方西在甘州时,他的一位讲授教理者给超过300人授洗^{[14]287}。这应是李方西在甘肃传教时,天主教拓展到甘州的确凿证据。

6. 张安当。《甘肃天主教志》称:“康熙三十年(1691)有耶稣会士、传教士,意大利人张安当(Posateri, Antoine)由陕西来甘肃传教,得康熙十四子允禔捐助,于凉州城内和西乡松树庄各建成初具规模的教堂一处。”^{[4]10}《甘肃通志稿》甚至称:“又云,康熙十四子允禔奉天主教,凉州天主堂即其所施,不知确否。”^{[6]21}《武威县天主教福音奉教人数表》称:“武威天主教设立年代:康熙三十年。天主堂地址:城西南隅考院街一处,西乡怀渠陈家松树庄一处。”^[15]张安当在甘肃传教亦有原始凭证。费赖之《张安当主教传略》:“1691年,张安当神父先后去了山西、陕西、甘肃,并在那里设立了若干堂口。”^{[2]445}荣振华《张安当》称:“张安当,字敬斋……1691年于陕西,后到甘肃。”^{[13]517}

根据这些有限资料,可以比较确切地知道,张安当在甘肃传教在康熙三十年(1691)后。武威松树庄天主堂始建于康熙三十年大致可信,一是成书于民国年间的《武威天主教福音奉教人数表》称,“武威天主教堂设立于康熙三十年”。二是教会内部《甘肃天主教志》亦称康熙三十年张安当在凉

州建天主堂，与西文资料合。但须指出的是，张安当康熙三十年修建松树庄天主堂时，不可能得到康熙十四子允禵的捐助。因为允禵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康熙三十年时，允禵才三岁。《甘肃通志稿》及《甘肃天主教志》称，康熙三十年允禵施舍建凉州天主堂，是决不可能的事。但康熙五十七年（1718）后，允禵主持西北军务达四年之久，再加上允禵与西洋人穆敬远关系密切，极有可能捐资建造凉州天主堂，但不应在康熙三十年，而应在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这就是说，凉州天主堂康熙三十年是初建，很可能是比较简易的建筑，康熙五十七年后，得到允禵捐助，才建起初具规模的教堂。至于允禵奉天主教之事，更是讹传，以目前所见中西文资料，尚未有记录允禵奉教之说，当为《甘肃通志稿》录入。

7. 艾逊爵（P. Joseph-Antoine Provana）。字若瑟，意大利耶稣会士。康熙三十四年（1695）来华，主要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传教，并负责该地的教务^{[2]562}。康熙三十八年（1699），甘肃总督写信给北京东堂的席老爷（疑为席澄元），要求派神父来兰州传教，艾神父遂来到兰州。总督给了艾神父一处住所，艾神父在兰州创建了一个天主教社区。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兰州建起了两座小礼拜堂（艾神父于康熙四十一年调回北京）^{[14]287}。后来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功贤接受。

8. 孟正气（Jean Domenge）。字若望，法兰西人，1698年来华，据荣振华资料，于1703~1712年在陕西西安传教，又据荣氏《1700年前后中国北方的传教区》一文，康熙四十五年（1706）曾到过西宁，为七到八个成年人逐个洗礼。孟正气在1706年还到过凉州传教，他说当时“凉州已经有20户基督教家庭”^{[14]288}。但细节不详。

9. 穆敬远。清代进入甘青地区传教的耶稣会士还有一位，即是葡萄牙人穆敬远（Jean Mourão）。穆敬远神父康熙三十九年（1700）来华，后进入清宫，担任康熙帝的翻译。允禵为康熙第九子，“最敬爱西士，与穆敬远神父，为莫逆交”^{[8]195}。雍正元年（1723），雍正命允禵出驻西宁。允禵邀穆神父同往。后苏努子勒什亨、乌尔陈亦因袒护允禵获罪，“着革职发往西宁，跟随允禵效力”^[16]。在西宁穆敬远与允禵、勒什亨、乌尔陈朝夕相处，“允禵于圣教道理，知之甚悉”，勒、乌二人则“遂领洗焉。勒什亨圣名类思，乌尔陈圣名若瑟”^{[8]197}。穆敬远在西宁不仅给清宗室人员授洗，而且在苏努家人的帮助下，在西宁地方设法传教。据费赖

之《穆敬远神父传略》称：“雍正帝登基伊始，穆神父被诬控参与皇弟阴谋一案，因而被充配边疆。穆神父照常从事传教工作，并在苏尔金或苏努（Sourmia或Sounou）家人协助下，在青海地区劝化了几家教外人，造了几处圣堂。”^{[2]669}巴多明神父1724年8月30日北京的信亦称：“（年贡尧）在奏章中，他控告类思（勒什亨）和若瑟（乌尔陈）进了基督教，还花钱造了一座教堂，并经常秘密地和穆敬远神父交谈”^{[17]27}。

荣振华根据档案资料称：“1723年开始在西宁建教堂，不久之后此地就发生教难”^{[14]288}。这教难明显是指抓捕穆敬远进京之事，故1723年西宁所见教堂当为穆敬远所建。而赵盛世先生认为：勒世亨与乌尔陈可能有在西宁传教和捐资建堂的企图，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也难成为事实。以“被人监视的情况下而难以传教”为由不能成立。又言短短二三年内，很难在一个从未受过天主教影响的地区内传教建堂。此说更不能成立^[18]，一是前已证明，至雍正初时，西宁地区已多次接受天主教影响；二是事实上方济各会士叶功贤在1713~1716年间已在西宁传教，1713年还在西宁买了一座亚美尼亚人的天主堂^{[14]287}；三是二三年时间足可以使一个地区的天主教获得一定程度的传播，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故赵先生之说法不能成立。

雍正四年（1726）二月雍正帝下达谕旨，将穆敬远“立刻九条锁拏解来京”。雍正五年七月，穆敬远病故途中^{[19]148-153}。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四年，穆敬远及勒什亨、乌尔陈至少有二三年时间在西宁传教，除了在西宁建造了一座教堂外，他们的传教活动应为天主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0. 除上述传教士进入甘肃外，康熙三十六年（1697），安多（Antoine Thomas）与张诚（J. Fr. Gerbillon）神父随康熙出征噶尔丹经过宁夏，他们在宁夏传播福音，“还付洗了一些人”^{[14]288}。康熙四十七至五十（1708~1711）年间，为绘制《大清皇舆全览图》，先后有杜德美（Pierre Jartoux）、雷孝思（Jean-Bapt. Régis）、费隐（X-E Fridelli）、汤尚贤（P-V. du Fartre）、麦大成（J-Fr. Cardoso）、阳秉义（Fr. Thilisch）及潘如（Bonjour）神父进入甘青地区工作^{[14]287-288, [20]223-227}，他们是否在甘肃地区“给人付洗”，目前尚无资料佐证。但这么多耶稣会士（潘如即山遥胆，非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肯定对甘肃地区的福音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展开的传教活动,而且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已建起了部分教堂和教会,并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据此可言,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康熙后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与甘肃天主教的发展

甘青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始于来自教廷传信部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熙二十五年(1696),教宗谕令,中国设立九大代牧区,陕西为其一,并任命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功贤(Basilus Brollo)^①为陕西宗座代牧主教。韩承良神父称:“到1700年代,我们可以说,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区已分成两个,即以前由西班牙主持的老传教区和近来由传信部方济各会士建立的新传教区。这个新传教区主要以由伊人任主教管理的山东临清教区以及由叶宗贤主教管理的陕西西安教区。”^{[21]45}

一般来说,方济各会内人士称留守山东的方济各会士为“保守派”(Observantes),而到西北边远艰苦地区传教的青年方济各会士称之为“革新派”(Reformati)。故进入甘青地区传教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多为青年革新派人士。

最早进入甘肃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为叶功贤(原名Giovanni Battista Maoletti,后称Joannes Bapt Maoletti)。叶神父1669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市附近的塞拉瓦勒镇,1688年加入方济各会革新派。康熙四十四年(1705)入华,并从广州来到西安,协助第二任陕西宗座代牧主教梅书昇(Antonius Loghi)传教,在西安建立一座新教堂,将西安发展成为意大利方济各会西北传教中心^{[22]89}。康熙五十年(1711),叶神父效法圣保禄作旅行传教,跟随他的仅有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传道员^[23]。首先来到兰州,接受了耶稣会士在兰州建立而后又放弃了的传教据点。他们在兰州居住两年,付洗170人,并在兰州东门外旧教堂的基础上重建一座新堂。在兰州,由于僧侣们的极力排斥和反对,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又迁居凉州,并在凉州建立两座教堂。这两座教堂即耶稣会的旧教堂

凉州西乡松树庄天主堂和凉州城西考院街天主堂,也是接受耶稣会的旧产。不久,转赴西宁,又在水宁买下了一座小教堂,并由一个亚美尼亚人管理。在西宁,叶神父工作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据叶神父1719年的信称,在甘肃,“在8年时间里我为212人付洗”^{[14]287}。康熙五十四年(1715),奉教廷命,将山西、陕西两教区合并为秦晋教区,由梅书昇神父出任首任主教。同时,又一批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先后来到陕西,为方启升(Franciscus Saracen)、麦传世(Franciscus Jovino)、劳佳碑(Gabriel a Taurino)、王方济(Franciscus Garretto)等4人。梅主教上任后,将全教区分为4个总铎区,为关中、陕南、兰州、山西。梅主教负责关中,叶神父负责兰州,其余二区由耶稣会负责。康熙五十七年(1718)甘肃大地震,叶神父返回西安^{[22]89}。康熙六十年(1721),叶神父被任命为湖广教区主教,定居湖南常德县。雍正禁教期间,叶神父从湖南逃出,准备去广东。雍正三年(1725)初,病逝于途中一个叫马路口(Ma-lu-ko)的小村^{[24]514}。叶神父在甘肃传教前后8年,在麦传世神父到来之前,始终是一个人在甘肃各地旅行传教。在此期间,他不仅接受、恢复、重建了一批耶稣会放弃的教堂和教会团体,而且在耶稣会旧有的基础上又发展了自己的新教区。荣振华是这样评价叶神父的传教事迹的:

叶神父提到一共有9个地方有教堂或布道堂,15~16个其他教会团体。有一些规模较大,而有的仅有很少的皈依者。像兰州和甘州的一些教会就很有可能是耶稣会士建的,还有一些如原卫卫的教会就是由热心的外行人建立的。但是,这些成绩毫无疑问大都是在先驱叶功贤神父的努力下取得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跟随他的仅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传道员。但是,他的传教很大程度是依赖那些愿意帮助他的人们,特别是他经常提及的各地教会的会长们,甚至还有个别女性教会团体的女掌门。

中文档案也保存了这一时期甘肃传教的简略讯息:

兹据该司等(布政司、按察司)详称,甘省地处边陲,土瘠民贫,耕牧者多,识字者少。先于康熙五十一年间,有西洋人麦传世、叶宗贤二人先后来兰,于东门外创立教堂,当时有无知愚民崇奉其教,吃斋诵经,迨至教

^①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译名同为“叶宗(崇)贤”者为两人,且均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1684年入华1686年被任命为陕西主教的“叶宗贤”西文名Basilus Brollo,而清档中在西安领票后来又去兰州传教的“叶宗(崇)贤”满文档作“雅崇贤”,西文名Joannes Bapt. Maoletti。前者生于1648年,1704年逝世于陕西三原;后者生于1669年,1705年来陕西传教,1721年入湖广传教,1725年逝去。故台湾学者为了区分,又将后者译为“叶功贤”。参见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89-90页;《意》沙法利《在中国传教区的意大利方济会上》,见《纪念孟高维诺总主教来华七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1995年,129-143页;《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Sinica Franciscana)卷第5514页注2。

裁, 叶宗贤知边地苦寒, 不能久住, 旋即他往, 未复回兰, 止留麦传世一人在甘。^{[19]224}

上述档案的行文好像是麦传世先于叶功贤来到兰州。事实并非如此, 叶神父到兰州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年^①, 而麦传世到兰州的时间则在康熙五十七年。其他记录均与中文资料合。

叶功贤神父在甘肃工作期间, 留下了一份传教地图及四卷注释报告, 其中对甘肃传教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他的地图并不像同时期耶稣会的地图那样经过精心准备和按照严格的制图法那样制作”^{[23]89-92}。但从地理注释中介绍的传教内容, 足以反映康熙后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在甘肃传教取得的巨大成绩:

兰州 (Lanchow)。这里是主教区, 有两所教堂, 一所为圣若瑟堂, 主要是男教徒来此。另外一所还没有完工, 专为女教徒所立。

平凉府 (P'ing-liang-fu)。虽然基督教早已在这里传教, 但到现在为止, 这里仍只有三四名教徒。自从这个新教区的管理者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狱后, 再加上我只是经过此地才来过3次传教, 因此这里没有教会和属于它的房屋。

岷州 (Min-chow) 还没有福音在这里传播, 我会把它留给Castrocaro神父或另外的教会组织去传播福音。

隆德县 (Lung-te-hsien)。有7个教会, 知县的母亲也是基督徒, 就连知县本人也想要接受洗礼, 我曾向他传教长达8天之久。那里的地方官员也喜欢教堂和教会, 会长被称为汤保禄。

静宁州 (Ching-ning-chou)。这里有基督教传播, 而且是一个重视文教地方。学官是一个和教会有密切关系的人, 他乐于建教堂, 但也更偏于建有教会的居住区。会长是王奥斯定, 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 同时也是一个新信徒。

固原卫 (Ku-yuan-wei)。这里教区的会长是一位监生, 叫何阿伯斯鲁, 系扬州府人, 他在南京受洗于最令人尊敬的神父余宜阁 (a Leonissa, Nicolay) 阁下, 他曾经是我的传道者, 对于他来讲, 来这里建立的这些教区和其他的修会都是应得的, 如果这里教堂和教会成果颇丰的话, 都是可以理解的。

庆阳府 (Ch'ing-yang-fu)。虽然这里没有很多的传教会, 但不管如何, 如果有一个教堂和教会, 那就很有希望使得教会在这里繁荣起来, 很感谢热心的会长, 他是相公的助手。

宁夏 (Ningsia)。那里很多文人倾向于教会, 他们都许诺我去宁夏购买一个教堂, 他们就愿成为信徒。会长是一位教书先生, 名为Bonaventure, 中文名文都辣。

巩昌府 (Kung-ch'ang-fu)。在长期的传教后, 我已经建立了一个教会, 会长是邓玛宴, 一位乡约的儿子。

临洮府 (Lin-t'ao-fu)。那里的成果有: 会长冯保禄, 一个好人。汤先生, 一个能在屋里作弥撒的新教徒, 他生前许诺要帮助我们在这里买一个教堂, 我希望这件事可以尽快完成。

河州 (Ho-chou)。教会的会长是卜玛宴, 他曾邀请我去那里给几百个人洗礼。新教徒们希望帮助我们买个教堂。

靖远卫 (Ching-yuan-wei)。不管如何, 我希望王发扁, 一个曾在兰州受洗的军士, 他能读能写, 希望他在回到他的家乡之后可以建立教会。

镇番 (Chen-fan)。那里的会长是一对弟兄, 分别为伯多禄和安德肋; 如果那里有演讲会, 则肯定变为一个很好的传教会, 因为那里的人们虽然很贫穷, 可很容易受教化。

陶家堡 (Ts'ui-chia-p'u) 有许多的基督徒, 这里有演讲会, 两个会长分别是陶维塔里斯和陶克莱门, 都是读书人。

永宁堡 (Yung-ning-p'u)。他的管理者是一个新教徒, 有两个妻子。他与别人合作建立了一个名为圣克莱门的小教堂。我曾来到这里, 在帐篷里向鞑靼人传教。永宁堡的会长是蔡保禄, 他给两个人举行过洗礼。

凉州 (Liangchow)。那里有一个教堂为男教徒所用, 另一个尚未完工, 是女教徒去的地方。

永昌 (Yung-ch'ang)。那里的会长是曹本笃, 一个年长的好人, 还有一个副将指挥官。

金川堡 (Chung-chieh-p'u)。有一个演讲堂, 文化人陈是一个新教徒, 有两个妻子, 会长陈伯多禄, 他的母亲是一个有300多女教徒的教会会长。

靖边驿 (Ching-pien-yi)。有一个演讲坛, 会长是一个读书人丁若翰, 他是12个男孩子的父亲; 他所有的儿子都结婚并接受了洗礼。

甘州 (Kanchow)。这里会长是叶裴理伯, 有需要建立教堂和教会。

肃州 (Suchow)。这里的教会会长是tsung-ping先生的管家, tsung-ping先生是教会的朋友。这座城市还有一个教派为皇极教^②, 他们的信徒在庙宇里只挂一个十字架, 并没有其他的神像。

庄浪 (Chuang-lang)。那里的教徒已经凑了钱帮助我买个教堂。

镇羌驿 (Chen-Chi'ang-yi)。教会会长是这里二把手的儿子刘伯多禄, 他的妻子Agatha是女会长。如果我的津贴可以尽快到达的话, 我希望在这里开始布道。

川口^③。(Chang-kou) 这里的会长是马多默。

西宁 (Sining)。有两个教堂, 一所为男教徒朝拜,

①中文档案称叶神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兰州, 李少峰书为康熙五十年(1711), 荣振华书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

②《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肃州地区的基督教, 是一种渗透着道教教义的基督教, 皇太极即太极的意思。

③在叶神父的地图上, 川口标在西宁河和大通河的交汇处, 即今青海民河之上川口。

另一所为女教徒设立,都是官方允许的,会长是休塞及邓巴尔鲁默(hsiu-ts'ai, Tung Barthlomew)。

镇海堡(Chen-ha-p'u),毗邻多巴。有一个很大的教堂,中国信徒的会长也是与之接壤的西藏区的会长。他叫郭安德鲁,一个有文化的商人。

多巴(Topa)。多巴,又作哆吧或多壩,位西宁城西50里,后改为新增堡,清时此地为一国际贸易地。参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2《建置堡寨》:“新增堡,城西五十里,旧名多巴”。多巴对于鞑靼国来讲这是一个军事要塞,有许多外国人在此经商,讲着15种不同的语言,在这座城市里,有亚美尼亚人的布道堂和小教堂^①。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1) 通过叶神父的努力,到康熙后期,天主教传教点已经遍布除西部安西及东部的秦州、阶州地区以外的全省各地,还包括当时属于甘肃的宁夏及青海东部地区。

(2) 在甘肃建成的教堂共有9座。兰州2座,凉州2座,永宁堡1座,庄浪1座,西宁2座,镇海堡1座。另外在多巴还有亚美尼亚人建立的教堂。还有临洮与河州的新教徒准备捐钱买房建教堂。另外,在兰州、凉州、西宁、金川、镇羌等地均建有女信徒的教会组织或教堂,其中金川堡的女教会颇具规模,达300人。

(3) 教会组织则分布全省24个城镇,并由中国籍的神职人员担任教会会长,有些地方还有相当规模的女信徒教会。

从表1可以看出,叶神父不但注重在各地发展新的教会,更注重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而各地的会长大多由当地的文化人或乡绅、地方官的子弟担任。

(4)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叶神父的地图注释中提到,他曾于青海湖旁的蒙古部落中传教,并称“有十字架高耸在四户蒙古包中间,意味着那是一个基督教村落”。又称:“我曾来到这里,长城外10里的地方,在帐篷里向鞑靼人传教”。又称:“我曾来到这里,那些蒙古包是用灰毡子做成的圆形建筑。今天仍有两个基督徒在那里”。这就是说叶神父不仅在甘肃的汉族人中传教,也曾对进入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传教,而且已有了一批皈依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图中注释称镇海堡教会会长郭安德鲁还兼与之接壤的西藏区教会会长^{[12]345-455, [23]88-92}②。这个西藏区,当是指甘肃青

海之安多藏族,则似乎在当时的安多藏族中,也有一部分人皈依了天主教。如果再加上多巴的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则可知康熙后期青海境内的天主教徒包括汉、蒙、藏及亚美尼亚多个民族。这是甘青民族宗教史上颇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表1 甘肃及周边地区教会组织分布情况表

教会地点	会长
兰州(主教区)	不详
固原卫	何阿伯斯鲁
巩昌府	邓玛突
镇番县	伯多禄和安德肋
凉州	不详
金川300人女教会	陈伯多禄母亲
肃州	邓平先生的管家
川口	马多默
隆德县(7个教会)	汤保禄
庆阳	相公的助手
临洮府	冯保禄
陶家堡	陶维塔里斯及陶克柴门
永昌县	曹本笃
靖边驿	丁若翰
庄浪卫	不详
西宁	休塞及邓巴尔鲁默
静宁州	王奥斯定
宁夏	文都辣
河州	卜玛突
永宁堡	蔡保禄
金川堡	陈伯多禄
甘州	叶斐理伯
镇羌驿	刘伯多禄
镇海堡	郭安德鲁

三、雍乾时期的禁教对甘肃传教的影响

可以说,康熙后期是明清之际甘肃天主教发展的最好时期,以兰州为总铎区的甘肃天主教已遍布全省,其中兰州、凉州、西宁、金川堡、永宁堡及镇海堡等地的天主教更是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一发展时期并不太长,从1711~1718年前后不过8年。由于“礼仪之争”引发的康熙末年的禁教已给清王朝的天主教传教带来了严重危机。康熙六十一年(1722),法国传教士宋君荣来华见到的中国天主教已经面目全非:

教堂被毁,基督徒被驱散,流亡的传教士在中国第一港广州闭门不出,因为他们不得进入帝国内地,宗教本身也即将被禁止,这便是我进入帝国之际呈现在我眼前的凄惨景象。^{[17]第2册,281}

据荣振华所引之档案称,1717年,兰州一带掀

①17~18世纪的中亚贸易中亚美尼亚人是惟一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他们常常从波斯进入西藏、青海进行国际贸易,而多巴就是他们的聚居地。

②教廷传信部于18世纪初派意大利方济各会在印度东北部及西藏地区建立西藏传教会,这一西藏传教会与本文提到的西藏区教会没有任何关系。18世纪初在西藏建立的西藏传教会主要在拉萨附近传教,而未进入青海。

起了新的禁教高潮^{[14]287}。

1. 雍正元年教案。雍正继位之初，雍正元年七月爆发的福安教案点燃了全国性禁教之火，由礼部颁令各地官员严禁民人信奉天主教：

查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愚夫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以诵经为名，会集男女，于地方毫无裨益。应如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教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飭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除，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禁飭，容隐不报者，该督抚查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可也。^{[19]138}

据1724年10月16日冯秉正神父的信：“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完全被禁止，所以传教士——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的如此可悲的下场。”^{[17]第2册，314}

而且在直隶、广西、福建、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山西、陕西均发生了拆毁教堂或改造教堂，甚至殴打传教士事件。“眼看着三百余座奉献给真正上帝的教堂落入非基督徒之手，又目睹三十余万基督徒因没有教士和神父而失去一切神佑”^{[17]第2册，314}。即使在极其偏远的甘肃省，雍正元年的禁教也给刚刚兴起的甘肃天主教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据乾隆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复尊旨访辑并无西洋传教士在境折》记载到：“雍正二年，奉旨着将西洋之人送回本国，随将麦传世委员伴送广东，转发澳门安插，所遗教堂，入官改作甘司茶库在案。迄今二十年来，并无复有西洋之人在境。唯麦传世去时，教内一切图像经卷，原未令其销毁，以致入教之民，间有收存者。”^{[19]224}

礼部的禁令是雍正元年十二月份颁发，到雍正二年，甘肃就开始了对麦传世的抓捕遣送。

麦传世，字永文，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先被派往山西传教，康熙五十七年（1718），甘肃大地震，叶功贤神父返回西安。即前引档案所言：“叶宗贤知边地苦寒，不能久

住，旋即他往，未复回兰”。地震后，梅主教赴甘肃视察，见甘肃无传教士管理，遂派麦传世神父来甘肃，管理甘肃教务^{[22]89-91}。据民国三十年《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坟冢碑记》：“公讳传世，永文。泰西意大利人，圣方济各会修士。于康熙五十七年来华传天主教于兰、凉。后于1737年乾隆二年丁巳升代牧大主教，未及赴，以疾终本郡凉州圣堂。时五月十五日，年五十三岁。”^{[11]226}

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到乾隆二年（1737），首尾共二十年。可知，麦神父乃明清之际在甘肃实际传教时间最长的一位欧洲传教士。雍正禁教，麦传世与陕西的其他传教士于雍正二年（1724）一同被驱逐至澳门。雍正四年（1726），麦神父又潜回内地，继续在甘肃传教^{[25]90}。据方济各会档案：“这位主教传教地区非常之广^①，虽在教难之际，他跑遍了山西、陕西、甘肃地区，到处传教救人。是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因此，虽然在那整日奔走逃亡的时代，他仍将一些圣书翻译成中文”^{[21]60}。

乾隆二年升任四川代牧大主教^②，但尚未赴任就病逝于凉州圣堂，享年53岁。当时出任陕西代牧者为方启升主教，见甘肃传教无西教士，遂派意大利方济会士Seraphinus Rumpler到甘肃凉州，接替麦传世的工作。^{[21]60[25]145^③}

2. 乾隆十一年教案。乾隆十一年（1746）在福安再次爆发教难，5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被杀，乾隆帝还对全国颁旨：

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飭地方官，严加访緝，如有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具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勿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26]

一场严厉的禁教风暴在全国掀起：

皇帝的敕命则根据总督和巡抚们向其下级解释，而在不同程度上被忠实执行了。在许多地方有人抢劫了基督徒们的住宅并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偶像崇拜者们的惶恐在属于宗教的一切问题上都爆发了：圣像、十字架、念珠、蜡烛、教堂装饰物、圣骨盒、圣牌；一切均被大火焚毁，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他们那暴虐宗教的警觉。甚至连论述我圣教和直到现在尚有幸遭受难的中文书籍，同样也被判作火刑。大部分教堂都被彻底摧毁。^{[17]第4册，336}

就是僻处西陲边地的甘肃天主教也未能幸免。

①Necrologium Fratrum Minorum in Sinis (Hong Kong, 1978. P90)。麦传世传教地区除甘肃外，还到过新疆伊犁。

②据《武威金石录》之麦传世碑，称升任四川代牧大主教，而Necrologium Fratrum Minorum in Sinis一书则称“当选为领Olonens主教銜的四川助理代牧”。

③据称“德国籍的汪神父（Rochus Wohnsiedler）在1725~1744年间曾在甘肃做了许多传教的工作”。

万方数据

甘肃巡抚黄廷桂乾隆十一年八月接到乾隆皇帝六月二十六日的上谕后,立即在甘肃各道府“严加访缉”,对甘肃各地的天主教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当时秘密在凉州等地传教并担任陕西代理主教的Rumpler神父遭到当局的缉拿追捕,四处逃亡,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逝世于陕西城固的小寨子^[25]¹⁴⁵。在这次教案中甘肃地区查出一批信教的中国基督徒:

今查兰州府属皋兰县民,有王俊、李玉、朱珍等二十一人;西宁府属西宁县民,有杨春禄及已故之宋文志,凉州府属武威县,有兰州人流寓凉州居住之魏简及本地民人冯训、张明堂,并已故之卢斌、孙龙菊,俱系当日在兰(州)拜叶宗贤、麦传世为师,吃斋诵经,各首出图像、经卷、念珠等物,讯非近日入教,并无曾设立会长、创建教堂,亦无引诱男妇礼拜诵经各项情事,先行详报前来。臣查天主教系外洋左道,岂容传播,但王俊等俱系无知乡愚,因从前入教,收藏图像经卷,各自在家拜诵,并无引诱招摇之事。随将王俊等二十余人,勒令改过开斋,并将首出图像经卷概行销毁,以绝根株。^[19]²²⁴⁻²²⁵

从黄廷桂的奏章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1) 雍正元年的禁教虽然影响到甘肃,将部分教堂改作仓库,并将麦神父驱逐出境。但甘肃天主教之薪火并未熄灭。随着麦传世神父重新潜回甘肃以及接替麦神父的Rumpler神父的到来,甘肃各地天主教传教活动依然在进行。

(2) 乾隆十一年禁教甘肃虽然也在执行中央的禁教令,但执行情况明显带有一定的敷衍中央的性质。在全省只在兰州、凉州、西宁三个中心城市进行清查,仅查出二十余名基督徒,这与当时各地天主教传播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3) 对清查出来的中国基督徒也实行较宽松的处理方法:“勒令改过开斋,并将首出图像经卷概行销毁”。这种形式上的“改过”,实际上为保存甘肃天主教传播的种子留下了机会。

3. 乾隆四十九年教案。18世纪60年代前后,欧洲各国先后取缔与解散耶稣会。不久,就出现了这样的传闻:中国皇帝准备颁布弛教禁之上谕。西方天主教界都以为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到来,于是,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起,欧洲各国便纷纷准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法国首先派3名遣使会士来华,不久,罗马传信部也向中国派遣11名意大利传教士,其中6名方济各会士,3名圣约翰布

道会教士,2名奥斯定会士,同时巴黎外方传教会与西班牙方济各会也各派1名传教士进入中国^[27]²⁸。乾隆的天主教政策并不比雍正时宽松,虽然他有个别时期曾与在京的天主教艺术家关系十分密切,也曾表示过对某些传教士的好感,但他始终坚持,除北京与广州以外,中国其他任何省份均不许传教士居住。

这一批初来中国的传教士聚集传信部设在广州的账房(当时中文档案称“罗马当家”),等待内地教友将他们分别秘密带往各省。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起到四十九年中,先后有3批传教士由内地教友带领潜入直隶、山东、陕西、四川等地;其中去意大利方济各会陕西传教区的最多^①。当这批传教士前往陕西时,陕甘地区刚刚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近闻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28]⁶³⁷稍后的传教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称中国政府:“为了镇压反叛,维护国内安定,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清廷官吏非常害怕教徒同反叛者串通一气,担心成群结队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支持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建立基督教——伊斯兰教同盟。”^[27]²⁹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开始了对潜入中国内地传教士的全面抓捕行动,导致了乾隆四十九年的全国性大教案的爆发。这一场教案陕西首当其冲,而甘肃之天主教则再遭劫难。关于这次教案保存的中文档案达数百件之多,兹选其有关甘肃教案的几件档案录文如次:

(1)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陕甘总督福康安奏报缉拿习天主教之人刘必约等事摺》:

接据西安臬司王昶禀称,陕省续查出素习天主教之刘必约向在业经拿获解京之唐烈家居住。据唐烈之子供出刘必约于九月中,闻有查拿天主教之信,即带雇工渭南县人张宣出外,不知何往,该犯祖籍四川成都县,迁居甘省甘州石泉子地方,有伊侄刘良、刘臣在彼居住等语。……并即经檄飭甘肃臬司一体通飭密查,严緝去后,兹据陕甘省续查出刘必约一犯,亦系素习天主教在已经破案之唐烈家留居二载,又与焦振国伙同开铺,迨闻查拿天主教之信,旋即远颺,其为知情预谋已无疑义,今或潜来甘省,自当迅即查拿,即使已回川省,现有伊侄刘良、刘臣尚在石泉子住家,若早为查获,即可究出刘必约现在踪迹及平

^①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87页称:“澳门主教区于1784年初先后派出三批传教士潜入内地”。此说实误,这三批传教士均由罗马传信部派出,并非澳门主教区。当时的澳门教区只能管辖广东、广西、海南及澳门的天主教事务,无权派教士进入中国北方诸省。

日有误伙党潜匿在甘，以凭彻底查办。再查甘省向未有传习天主教之人。今既据陕省供出刘必约一犯在甘州境内居住，保无附近乡愚为其煽惑。恐甘省另有入教匪徒，不止在石泉子一处，臣仍加意访察，倘有端倪，即当彻底追究。^{[28]520}

(2)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奏报辑获习天主教之人刘臣讯供片》：

兹据该府（甘州府）扎可桑阿禀称业将刘必约之侄刘臣、刘刚等获讯，据供称刘必约并未回甘，张宣亦未潜来，并查出刘臣家该处民人徐健之婿，亦系旧经天主教之人，现在刘臣家内搜出经卷一本，徐健家内搜出经卷一本，画像三轴等情。查刘必约既经西安潜匿等，知不即回甘州，所称并未回甘，殊难凭行旦又等。知否潜匿他处，至现获之刘刚等。^{[28]522}

(3)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遵旨查拿传习天主教之西洋人片》：

据供：陕西汉中府有本地人刘西满，山西洪洞县具有湖广人尚神父，潞安府有山西人葛神父即葛汉若，大同府有甘肃人徐神父即徐盖达诺，……俱常有书信往来。^{[28]582}

(4)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折》曰：

臣查刘必约曾受神甫名目，系与杜兴智起意延请西洋人来陕传教。张多明我系接引马诺等至陕，均为此案要犯。随率同按察使王昶等亲加严讯。据刘必约供：年七十岁，是四川金堂县人，祖传天主教，十岁时父亲刘正常托人将我带往广东澳门学习西洋说话，十六岁上西洋拿波里教城，从师读洋字经典，住居十五六年，回至四川，旋到西安。先在泾阳开张药铺，后在省城唐烈家居住共三十多年，与呢吗方济各们相好，上年九月间焦振纲、秦伯多禄往广东生理。我与杜兴智相商寄信与罗马当家，请西洋人来陕传教。今年春间，焦振纲们回陕说罗马当家已派有西洋人几名，因他们路上不便携带秦伯多禄，说随后差人送到樊城斗。我们五月内去迎接，后因甘肃回子滋事，沿途盘查严禁，没去接引。到八月间，曾贵从湖广寄信到陕才知西洋人被拏，迨焦振纲们又赴广东买卖。我寄汉字信一封与广东潮州府人戴加爵，洋字信三封，一与曾贵，一与秦伯多禄，一与湖南沅江县人刘五即刘开迪，都说西洋人被获的事。九月间听闻查拏焦振纲们，心里害怕，想往甘州侄子刘良、刘臣处躲避，就同工人张多明我起身由偏僻小路行走，因中途害病，又闻查拏紧急，无处藏匿，想回西安探听刘义长等消息，才到城外就被拏住的。我因在洋里住过多年，认识洋字，所以众人称我神甫，实未受有执照。至每年西洋原有番钱八十五个给我，俱从在广州住的

西洋人方济各若汉交便人寄来。刘西满所得番钱并往来书信俱是我转寄等情。臣查该犯所供，虽与湖广并陕省所讯焦振纲等及呢吗方济各等供情相符，但该犯宁不知天主教久经严禁，乃与杜兴智商同延请洋人来陕传教，其意究欲何为，平日有无知惑众为匪情事，复严加诘。据供，因乡愚无知，妄信传习其教可以免祸邀福，并无他意。至我平日原曾与同教人讲解洋经，亦无勾结为匪别情。又据张多明我张宣供，年四十岁，本名张文郁，陕西渭南县人。也是祖传天主教，乾隆二十六年上到广东，遇见澳门人马诺并西洋人巴尔哈那比。原同他们到西安，马诺即往渭南居住，巴尔哈那比就往山西绛州，后来不知去向。我因刘必约通晓西洋经典，已跟随他十多年。至此次延请西洋人来陕传教，是刘必约与杜兴智商议的事，我并未预谋等情。臣查刘必约私赴外洋传习异教，妄称神甫得受番钱，已干法纪，又复起意招致西洋人来陕传教，坏风俗而惑人心，莫此为甚，其情更为可恶。至张多明我此次虽未同谋，但从前先已接引马诺等至陕，以致后人效尤罔顾，例禁情罪亦难宽纵，自应将该二犯解京归案审办，除飭委员并同前获之刘西满等一并解赴刑部收审。^{[28]629-631}

(5)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寄谕陕甘总督福安康、陕西巡抚毕沅着严密访拿甘陕二省行教西洋人》：

据福安康奏：于甘、凉二府拏获传习天主教之张继勋、刘志唐等，并起出经卷等物，现飭解省审办。^{[28]634}

(6)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陕甘总督福安康奏报审讯天主教案内犯刘多明我等分别解京折》记载：

窃照甘省拏获天主教案内要犯刘多明我及刘必约之子刘臣、侄刘刚并同教人张继勋、徐健、李文辉、李之潮、陈俊、马朝斌、段照喜、刘志唐、牟亭澹、毛纪成等，经臣提省审讯，并先后奏闻在案。嗣据甘、凉二府属续查出天主教人犯杨生荣、韩守元、张儒、张文等七十二名，先后拏获具报，并将刘多明我各犯押解来省。臣率同臬司汪新逐加严鞫，据刘多明我供系陕西临潼县人，父刘一常、兄刘志唐俱习天主教。该犯于乾隆二十七年前往广东，即在澳门地方跟随西洋人巴拉底诺习教多年，迨后巴拉底诺回西洋，该犯于四十二年回至西安，每年得受西洋人番钱八十五圆，系由焦振纲、秦伯多禄二人带给刘必约转寄该犯。嗣经来往凉州、甘州一带，仍回西安。四十八年在渭南地方认识西洋人方济各，四十九年又见过一次，闰三月内由西安起身贩卖药材生理，四月内到兰州，在同教李胡子即李文辉家居住数月，嗣因索欠同李文辉及雇工人牟亭澹前赴凉州，由凉州至甘州，曾在石泉子刘臣家内住居数日。嗣伊父遣伊兄刘志唐找寻回家，行至山丹县新河地方即被拏获等情。臣以该犯素从西洋人习教，所认识者必

多,其来往兰州、甘、凉一带必有勾引西洋人前来传教之事。复向该犯诘讯,据称前在广东只认识西洋人巴拉底诺,后在渭南曾认识方济各,此外别无认识之人,至每年得受洋钱代为传教是实,其西洋人从未来过甘州、凉州一带等语。再三严鞫,矢口不移,又讯据刘必约之嗣子刘臣、侄刘刚供称,刘臣教名斯德望,刘刚教名安得力,原籍四川,祖传天主教,刘臣自幼跟随刘必约到西安,于乾隆二十八年同到山丹县石泉子地方做买卖,仍回西安。后因刘臣妻父徐健在山丹县陈户寨居住,遂于三十二年遣往徐健家就婚,随于石泉子住家。刘必约仍住西安,刘臣常往探看。四十六年刘刚亦由四川前赴西安探望伊叔,上年正月内刘必约遣刘臣、刘刚同回石泉子,十月内被鞫,其刘必约与西洋人往来情事并不深知等语。又据李文辉供称,教名尼里牙,与刘多明我熟识往来,上年同赴凉州。又据徐健供称,教名安得力,与刘必约儿女姻亲。又据刘志唐供称,系刘多明我胞兄,教名格斯末。又据牟亭潜供称,教名米额儿,雇给刘多明我跟随行走,伊等金供系传习天主教,并不认识西洋人等情。臣查刘多明我一犯幼在广东,曾从西洋人巴拉底诺习教,每年得受洋钱,又与西洋人方济各认识,其所称并未勾引西洋人潜来传教,显系一面之词,殊难凭信。现在各省鞫获西洋人俱已解京,其刘必约一犯亦经陝省鞫获解京,自应将该犯刘多明我一并解京归案质讯。至刘必约之嗣子刘臣、侄刘刚、与刘必约儿女姻亲之徐健、暨容留刘多明我在家居住同赴凉州之李文辉、又跟随刘多明我之牟亭潜及刘多明我之兄刘志唐六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亦未受过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其刘多明我家产已据渭南县查抄。至刘臣系刘必约嗣子,所有家产亦应查抄。臣先已飭令甘州府知府札克桑阿前往该犯所居石泉子地方严密查办。其张继勋、李之潮、陈俊、马朝斌、段照喜、毛纪成六犯,讯明并未认识西洋人,亦无教名,止系祖父相传习教,自应钦遵谕旨照例办理,将查出经卷图像等项烧毁,仍勒令具结改教,交保管束其续,经查获天主教人犯杨生荣、韩守元、张儒、张文等七十二名逐加研讯,止系祖父相传习天主教,并无与西洋人往来情事,应请均照此办理,汇行咨部完结并将起获刘多明我等经卷、神像、画图、十字架等物概行销毁,所有此案刘多明我等犯罪,分别解京拟遣。^{[28]662-665}

这次甘肃教案中牵涉的最重要的人物有两人,其一为刘自珍,教名刘必约^{[28]641},四川金堂

县人,天主教世家。康熙五十二年(1714)生,雍正二年(1724),其父刘正常托人将其带到澳门学习外语,雍正八年(1730)到“西洋拿波里数城”^{[28]615-616}学习天主教,时间长达十五六年,并晋升司铎^{[28]648}。乾隆十年(1735)前后回国,先在四川,后在西安传教。另一人为刘志虞,教名多明我,陕西临潼县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往澳门跟随西洋人巴拉底诺学习天主教,后晋升铎,乾隆四十二年(1777)回西安传教,亦经常赴甘、凉二地传教。他们并长期获得澳门方面经费资助,大约每位中国籍神父的传教经费是“西洋人番钱八十五圆”^{[19]484}。乾隆四十八年(1783),刘必约听到一批传教士来华,遂与焦振纲、秦伯多禄、杜兴智商议,延请“西洋人来陕传教”。后闻焦、秦二人被捕,遂逃往甘州其子刘臣住处,途中亦被官兵抓获。紧接着又在甘、凉二地进行搜捕,先后两次抓获的教友刘多明我等88人。在清政府官员的心目中,乾隆四十九年教案大爆发前,“甘省向未闻有传习天主教之人”。他们认为,甘肃经过雍正元年及乾隆十一年禁教,教堂已被改作他用,圣像、经卷也已经销毁,教徒亦“改过开斋”,甘肃的天主教教已绝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韩承良神父称:

意大利来中国的方济会士,都是以传信部的名义到达中国的,因此向来被视为传信部人员。他们的传教区大都在中国遥远的西北地区,因此,在教难时期生活更为艰苦。但他们勇敢地照顾了自己的传教区,以致在整个教难时期,他们的教区从未缺少过传教人员。由于他们是传信部人员,所以他们更为顾及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就在教难期间,于1729年王方济主教在陕西建立了修道院。但不久即将之关闭,因为教难愈演愈烈。虽然如此,在那种困难的时期,每位传教士仍尽力在自己手下养活几个儿童,当看到确有圣召者,便打发他们出国去意大利的拿波里圣家学院读书修道。这实在是非常明智的一着,因为到了18世纪的末叶,在他们的传教区中,中国神父已超过了外籍人员!有些中国神父的教育完全在中国完成的,且是在那艰苦的教难时代!其中有王多默及赵格思默两位传教员,受了当地主教的亲自教育,传信部准许他们在中国祝圣神父。这两位中国神父数十年之久做了很好及有效的传教工作。^{[21]69-70}

从韩神父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甘肃虽经过多次教难,但天主教从未在该省禁绝。从康熙五十年

①拿波里数城当即拉不勒斯城Naples,此即马国贤创办的意大利拉不勒斯的圣家学院,当时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曾派多名陕西、甘肃、山西中国青年到该院学习。陕西城固人刘西满亦是该学院毕业的神父。

②据称:“西洋人规例,由该国大主教给以神甫名目者,每年给花银八十五圆,其由澳门洋人给以神父名目者,每年给花银四十圆。”故知刘多明我是由西洋主教祝圣的神父。

(1711)叶功贤神父进入甘肃,意大利方济各会甘肃传教区就从未缺过欧洲传教士。继叶功贤者为麦传世,继麦神父者为Rumpler,而在教难期间,还一直有一位意大利籍的方济各会士在打理甘肃教务^{[21]70},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自1760年后,由于地区太过偏远艰难,交给中国神父来管理。”^{[21]70}由于传信部很早就注重培植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故甘肃的教务在没有欧洲神父的情况下,就由中国籍神父负责管理,中文档案中被捕的刘必约神父及刘多明我神父,他们虽然不是甘肃人,但确是教区派往甘肃负责甘肃传教的中国籍神父。前引中文档案中提到的徐盖达诺神父,却是当地主教培养的甘肃籍神父,而被派往山西大同传教。正因为这些外籍及中国籍神父在甘肃前仆后继地展开艰苦卓绝的传教,所以,甘肃这一极为偏远艰苦的传教区虽然历经多次教难,其天主教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前引中文档案在甘、凉二府一次抓捕天主教徒达88人即是明证。

乾隆四十九年教案对中国籍教友的处理十分严厉,远远超过雍正元年及乾隆十一年。清政府不仅将搜获的“经卷、神像、图画、十字架等物概行销毁”,对那些“并未认识西洋人,亦无教名,出系祖父相传习教”者则“勒令具结改教,交保管束”;对刘臣、刘刚、徐健、李文辉、牟亨漕、刘志虞等六人则“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8]665};而对刘必约与刘多明我两名中国籍神父则解京审办,最后也是“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9]。

乾隆四十九年教案对甘肃天主教的打击是严重的。不仅将潜往陕西境内的西洋传教士大部分抓捕,致使后来再无西教士进入甘肃传教,而且当时甘肃天主教基层教会组织的主要骨干力量(包括几位中国籍神父)均被发配伊犁,到厄鲁特蒙古部落为奴,致使甘肃本土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故到嘉庆十年(1805)再次爆发全国性的大教案,陕甘总督倭什布清查甘肃天主教时称:

伏查乾隆四十九年前督乃福安康准咨拏获在甘凉州一

参 考 文 献

- [1] 参见(清)刘郁芬,等.甘肃通志稿:民族志及外交志[M]//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卷;同文轩.甘肃天主教志[M].兰州:甘肃省宗教局与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会编,1997;胡世斌.天主教区天水传教史[M].甘肃天水教区(内部打印稿),1999;师彦灵.西方传教士在甘肃的活动[J].丝绸之路,1999(3);陈静.基督教在甘早期传播史事发隐[J].西北民族研究,1993(2);房建昌.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年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4);赵盛世.关于雍正初年天主教传入青海的几点意见[J].西北民族研究,1988(2);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天主教神甫及清廷信教宗室之来青海: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177-179.
- [2] (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十列传(1552~1773)[M].梅乘骐,梅乘骏,译.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

万方数据

带传习天主教之刘多明我并刘必约之子刘臣、侄刘刚等,审明具实,解京归案办理,其随同入教之人均经按例惩办,并飭地方官随时查禁,以绝根株。迄今二十余年,虽未闻有习教之人,但从前既经传染,地方官日久懈生,难保无奸徒故智复萌、潜相煽惑之事,且难免巩秦一带,毗连川省,川中传习既多,边界愚民亦恐渐为引诱。臣现已飭司刊刻膳黄,遍为张挂,并飭地方官于稽查保甲之便,剴切劝导,喻以邪正之理,开其自新之路。仍密行察访境内,如传有教之人,立行查拏究办,惩一儆百,并将所传经卷书籍一并查起销毁。^{[28]873-875}

倭什布称“迄今二十余年,虽未闻有习教之人”,即可说明乾隆四十九年的禁教对甘肃天主教打击是严重的。但此话并不完全属实。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对天主教大镇压后,秘密在地下活动习教的天主教徒还有人在,如韩承良所言“王多默”与“赵格思默”两位中国籍神父,他们就是在教难之后,坚持了数十年的秘密传教。嘉庆十一年(1806),中国籍神父张铎德受山西主教路类思的委派,“往甘肃各处访问,教中讲解十诫的道理”^{[28]901}。到嘉庆二十年(1815),又有“在甘肃工作的王保禄”神父被捕,并被关押八年,后被流放到察哈尔边区^{[21]82}。可见,乾隆四十九年的甘肃镇压天主教运动虽然使甘肃天主教一度沉寂,但却未完全绝迹。这些中国籍神父如王多默、赵格思默、张铎德及王保禄等仍坚持在甘肃各地传教。陕甘总督倭什布所言之“难保无奸徒故智复萌,潜相煽惑”^{[28]875},即是此指。

总之,尽管到清中期后,甘肃天主教历经多次教难,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在甘肃的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其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30]。

致谢:感谢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博士生韦羽及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致远翻译部分法文及拉丁文文献。

- [3] 罗渔泽. 利玛窦书信集: 下册·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608) [M]. 台湾: 辅仁, 光启联合出版, 1986.
- [4] 同文轩. 甘肃天主教志[M]. 兰州: 甘肃省宗教局与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会, 1997.
- [5] (清) 刘郁芬, 等. 甘肃通志稿: 外交志[M]//西北稀见方志文献: 第5卷.
- [6] (清) 刘郁芬, 等. 甘肃通志稿: 民族志[M]//西北稀见方志文献: 第5卷.
- [7] 方豪. 罗文藻: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第2册[M]. 上海: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2003.
- [8] 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M]//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 台北: 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3.
- [9] (法) 费赖之. 方德望: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上册) [M]. 冯承钧,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0] 胡世斌. 天主教区天水传教史[M]. 兰州: 甘肃天水教区(内部打印稿), 1999.
- [11] 王其英, 编. 武威金石录[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1.
- [12] 伍昆明.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 [13] (法) 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 耿昇,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4] Joseph Dehergne S. J. Les Missions du Nord de la Chine vers 1700: É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法) 荣振华. 1700年前后中国北方传教区: 传教地理研究[M]. 耶稣会历史档案: 24册, 1955.
- [15]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资料部藏. 武威天主教福音奉教人数表[M]. (民国抄本, 共2页).
- [16] 故宫博物院. 允祺允禧案[M]//文献丛编: 第1辑. 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 [17] (法) 杜赫德, 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信简集: 第三卷[M]. 朱静, 耿昇,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 [18] 赵盛世. 关于雍正初年天主教传入青海的几点意见[J]. 西北民族研究, 1988(2).
-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暨南大学古籍所, 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0] 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 [21] 韩承良. 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 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M]. 台北: 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 1994.
- [22] 李少峰. 方济会在华传教史, 罗光, 主编. 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M]. 台北: 光启出版社等联合出版, 1967.
- [23] (法) B. Szczesniakzn. 叶功贤神父对甘肃的描写及地图[J]. 澳门历史研究第2辑, 吴青, 译. 澳门: 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3. 现用文中译名本文著者又多数重译.
- [24] Sinica Franciscana. 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 第5卷[M]. 1954.
- [25] Guria Generalis O. F. M. Necrologium Fraerum Minorum in Sinis. Hong Kong, 1978.
- [26]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乾隆十一年六月庚寅: 卷269[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27] (法) 威克尔. 1784~1785年的帝国政府和在华天主教传教会. 转引自(法) 卫青心.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上卷[M]. 黄庆华,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第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9]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未: 卷1219[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30] 汤开建, 马占军.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甘肃传教述论(1878~1922)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3).

Survey of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Activity in Gansu in the 17~18th Century

TANG Kai-jian LIU Qing-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17th Century, around the time when the Manchurian occupation overthrew the Ming Dynasty, Catholic missionaries found new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nd in the Northwest, it was particularly so. Waves of missionaries, mostly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swarmed into Gansu and Qinghai, settled in such places as Lanzhou, Ganzhou, Liangzhou and Xining, and started church building and conversion. By the time of Kangxi's reign, Catholic missionary activity had been well established, and when the Franciscan monks came to Gansu the missionary cause gaine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atrocious persecutions against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converts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 the missionary influence remained till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Gansu; Catholicism; Jesuit; Franciscan; persecution

(责任编辑: 寇 甲)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作者: [汤开建](#), [刘清华](#), [TANG Kai-jian](#), [LIU Qing-hua](#)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刊名: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7, 35(5)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3条)

1. [刘郁芬](#) [甘肃通志稿:民族志及外交志](#)
2. [文轩](#) [甘肃天主教志](#) 1997
3. [胡世斌](#) [天主教区天水传教史](#) 1999
4. [师彦灵](#) [西方传教士在甘肃的活动](#) 1999(03)
5. [陈静](#) [基督教在甘早期传播史事发隐](#) 1993(02)
6. [房建昌](#) [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年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 1987(04)
7. [赵盛世](#) [关于雍正初年天主教传入青海的几点意见](#) 1988(02)
8.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 [天主教神甫及清廷信教宗室之来青海:青海历史纪要](#) 1987
9. [费赖之](#). [梅乘骏](#)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 1997
10. [罗渔泽](#) [利玛窦书信集:下册·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608\)](#) 1986
11. [同文轩](#) [甘肃天主教志](#) 1997
12. [刘郁芬](#) [甘肃通志稿:外交志](#)
13. [刘郁芬](#) [甘肃通志稿:民族志](#)
14. [方豪](#) [罗文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2003
15. [萧若瑟](#)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2003
16. [费赖之](#). [冯承钧](#) [方德望: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1995
17. [胡世斌](#) [天主教区天水传教史](#) 1999
18. [王其英](#) [武威金石录](#) 2001
19. [伍昆明](#)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1992
20. [荣振华](#). [耿昇](#)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1995
21. [Joseph Dehergne S J](#) [Les Missions du Nord de la Chine vers 1700:\(E\)d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1955
22.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资料部](#) [武威天主教福音奉教人数表](#)
23. [故宫博物院](#) [允禩允禧案](#) 1947
24. [杜赫德](#). [朱静](#). [耿昇](#) [耶稣会士中国书信简集](#) 2005
25. [赵盛世](#) [关于雍正初年天主教传入青海的几点意见](#) 1988(02)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暨南大学古籍所](#)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1999
27. [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1999
28. [韩承良](#) [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 1994
29. [李少峰](#) [方济会在华传教史](#) 1967
30. [B Szczesniakzn](#). [吴青](#) [叶功贤神父对甘肃的描写及地图](#) 2003

31. [Sinica Franciscana 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 1954
32. [Guria Generalis O F M Necrologium Fraerum Minorum in Sinis](#) 1978
33.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庚寅](#) 1986
34. [威克尔 1784~1785年的帝国政府和在华天主教传教会](#)
35. [卫青心, 黄庆华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1991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2003
37.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未](#) 1986
38. [汤开建, 马占军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甘肃传教述论\(1878~1922\)\[期刊论文\]-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3)
39. [而梅氏兄弟译本将“传教十五城”译为“在洋县、城固县和汉中府建立了若干新的堂口”](#)
40. [李少峰 方济会在华传教史](#)
41. [沙法利 在中国传教区的意大利方济会士](#) 1995
42. [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志](#)
43. [中文档案称叶神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兰州, 李少峰书为康熙五十年\(1711\), 荣振华书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
44. [《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肃州地区的基督教, 是一种渗透着道教教义的基督教, 皇太极即太极的意思](#)
45. [在叶神父的地图上, 川口标在西宁河和大通河的交汇处, 即今青海民河之上川口](#)
46. [17~18世纪的中亚贸易中亚美尼亚人是惟一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他们常常从波斯进入西藏、青海进行国际贸易, 而多巴就是他们的聚居地](#)
47. [教廷信部于18世纪初派意大利方济各会在印度东北部及西藏地区建立西藏传教会, 这一西藏传教会与本文提到的西藏区教会没有任何关系. 18世纪初在西藏建立的西藏传教会主要在拉萨附近传教, 而未进入青海](#)
48. [Necrologium Fratrum Minorum in Sinis](#) 1978
49. [武威金石录](#)
50. [据称“德国籍的汪神父\(Rochus Wohnsiedler\)在1725~1744年间曾在甘肃做了许多传教的工作”](#)
51. [张力, 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1987
52. [拿破里敷城当即那不勒斯城Naples, 此即马国贤创办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圣家学院, 当时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曾派多名陕西、甘肃、山西中国青年到该院学习. 陕西城固人刘西满亦是该学院毕业的神父](#)
53. [据称:“西洋人规例, 由该国大主教给以神甫名目者, 每年给花银八十五圆, 其由澳门洋人给以神父名目者, 每年给花银四十圆.”故知刘多明我是由西洋主教祝圣的神父](#)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钱国权, QIAN Guo-quan 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概述 -甘肃社会科学2005, ""\(3\)](#)
天主教四次传入我国, 国内外学者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 我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 对每个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了相应的梳理, 并简介了有关主要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总结了现阶段研究此问题的主要范式和方法。
2. 学位论文 [钱国权 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播和发展](#) 2005
唐贞观九年, 天主教的聂斯托利派(景教), 沿丝绸之路, 传入了甘肃。
元朝, 也里可温教, 主要在甘肃的河西地区传播。
明末耶稣会的万密克等传教士, 不时从西安教区来甘肃的武威、张掖等地, 布道传教, 并修建了简易教堂。
清康熙五十一年, 方济各会麦传世来兰州和武威传教, 在武威建堂传教达十九年。清光绪四年, 圣母圣心会大规模来甘肃传教, 先后有韩默理、陶福音、费达德主持教务, 把甘肃划分为陇东教区和陇南教区, 传播福音, 到1922年, 圣母圣心会离开甘肃时, 有教堂30座、教徒10811人。
1922年, 圣言会接替了圣母圣心会在甘肃的工作, 德国人濮登博为主教, 他改“南北制”为“东西制”, 把甘肃划分为兰州主教区(包括武威总铎区、张掖总铎区、陇南总铎区、陇西总铎区)、天水教区、和平凉教区, 到1953年, 圣言会离开甘肃时, 建有教堂192座, 教徒3万多人, 修道院4所, 医院33所, 小学18所。
综上所述, 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播, 不但历史悠久, 而且规模庞大。本文结合新翻译的外文教会资料和地方志档案资料, 试从传教的背景、传教的目的, 传教的方法、传教的内容、传教的经费来源、传教的结果和本土化, 对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播史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 以鉴往知来, 有益于治道。

3. 期刊论文 [刘丽敏, LIU Li-min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3)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4. 期刊论文 [张晓林 儒耶互动的诠释](#) - [甘肃社会科学](#) 2008, “”(5)

杨廷筠作为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依者,在对基督教重要观念的理解上,既与其传教士老师如利玛窦有相同,又有不同。不同在于他的独特的儒耶互动方式,具体体现于他对天主观念、理气观念及“天命之谓性”命题的诠释上。

5. 期刊论文 [刘淑青 查理宫廷天主教倾向的文化解读](#) - [甘肃社会科学](#) 2007, “”(4)

秩序和顺从是查理宫廷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符合秩序和顺从这一原则和审美情趣的一切符号经过改造后都被纳入到宫廷文化中。天主教仪式因其中蕴涵的秩序与和谐的美学观念而被纳入到宫廷的主流文化,成为贵族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学位论文 [华中 中国基督教地理的初步研究](#) 2006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信徒最多,2001年全球基督徒占总人口的32.54%,并以1.4%左右的年增长率不断增加。其信徒遍及全球各大洲,中国也是其传播范围之一。早在唐朝贞观9年(635年)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各地传播。根据《Operation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的统计,2001年中国有基督徒九千多万(包括港、澳、台),占全国的人口比例约为7.25%,年增长率达到7.7%,信徒遍及全国各省。

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基督教地理则是宗教地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至今只有郑耀星1997年发表于人文地理杂志的《福建省基督教地理的研究》一文对福建省1990年代后期基督教的传播和分布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本文对中国基督教地理进行初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阐述进行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研究内容为基督教在中国为唐朝、元朝、明末清初、近代和1949年以后五个历史时期传入的政治、地理背景和空间拓展过程、分布情况及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范围为中国全境,由于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围广,本文研究尺度一般以省为单位,在个别的年份当中,则以城市和县为尺度,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

第二章主要描述了景教在中东地区的发源、传播以及在唐朝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以唐朝都城西安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第三章主要论述元朝时复兴的景教和初来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分布。两者都是以北京为宣教中心,景教主要分布在北京、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中国西北部和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三省。天主教则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广东之间的沿海各省。

第四章主要论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沿海地区及陕西、山西等地传播和分布情况,指出当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分布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汉中、上海和南京、福州和澳门为核心的四个集中区域。并总结了前三次基督教来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

第五章重点分析新教从中国沿海到内地的空间拓展和分布,同时也概括性地论述了同时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新教在华的空间拓展分为四个时期:(一)预备时期:以马六甲为中心;(二)五口宣教时期:以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为中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教;(三)内地宣教时期:以沿海为基地,迅速向内地宣教,至1900年时,中国当时除西藏外都建立宣教士驻地;(四)全国宣教时期。新教的分布沿海最为密集,中部次之,西部分布则少得多。天主教在中国所有省区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直隶、江苏、湖北、广东、四川数省。而东正教则主要分布北京、蒙古、东北地区,在江浙、湖北和广东也有少量分布,无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与新教和天主教有很大差距。并简略地概括了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六章论述1949年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和分布情况,重点分析2001年中国基督教的分布情况。

第七章为结语,简要回顾全文,概述研究结论,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7. 期刊论文 [李伯栋 一次“世界末日”的来临](#) - [中国减灾](#) 2007, “”(5)

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47秒,甘肃古浪(北纬37.6度,东经102.6度)发生地震,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XI度,震源深度12公里,死亡万余人(一说8万余人),倒塌房屋40余万间。古浪属于凉州地区(今甘肃武威),是甘肃历史上的富庶之区。蒲登波罗克在他写给《字林西报》的信中说:“这样恐怖的地震使我感到世界末日将要降临。”蒲登波罗克是甘肃天主教的代理大主教,德国人。

8. 期刊论文 [常新, 薛志忠, CHANG Xin, XUE Zhi-zhong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2(2)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9. 期刊论文 [郑炜华, Zheng Weihua 放纵的智慧——《十日谈》的欲望表现](#) - [甘肃高师学报](#) 2005, 10(3)

《十日谈》有破有立,既以纵欲作为抨击天主教会的手段,又以理性节制各种欲望,辅之以推崇美好人性,意图实现和谐美好的社会新秩序。

10. 期刊论文 [魏静 试析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 [丝绸之路](#) 2010, “”(16)

本文通过对基督教(主要指天主教和新教)伦理道德内容的分析,探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基督教伦理思想体系及道德规范中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分为构建当代和谐社会服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zdxsb-shkxb20070500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8e0a221-e021-40b9-b83e-9e4d006e098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